

清华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动态

总字99期

2002年4月18日

“转轨时期农民行为的案例研究”系列文章之一

农民非理性，还是制度不完美？

——《农民的故事：转轨时期农民行为案例研究》^[1]前言

钟笑寒

(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)

2001年夏天的哈佛商学院之行虽然时间短暂，但给我的启发是深刻的。在向学员介绍哈佛案例教学传统的一篇文章里，谈到为什么要使用案例时，有一句话是：“商业不是，至少现在还不是，一门精确的科学。”^[2]

虽然推崇“实证”的经济学家很少考虑到，如果经济学关于企业理性（利润最大化）的假定成立的话，甚至管理科学本身的存在价值都值得质疑，但我们却不得不认识到，这句话甚至适用经济学本身（实际上适用所有科学）。

一、农民非理性，还是制度不完美？

以农民行为的研究为例，虽然有舒尔茨著名的“农民理性”论断，但并没有使得经济学在研究农民问题上毕其功于一役。实际上，经典经济学（“新古典范式”）最致命的问题也许就不在于理性人假定——这个假定的强壮性已经为贝克尔等经济社会学家所承认和利用。问题出在其对于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完备市场体系的假定上，这正是新兴的所谓“信息范式”的生长点。我在这里强调的是，这个市场体系对于人的理性实际上施加了过于严厉的约束，所谓“价格接受者”，实际上只是个人和企业的巨大决策空间的一个特殊的“退化解”。作出这个假定的前提恰好就是市场的完美性。它使得经济系统必须回答的三个基本问题，即“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，如何生产，为谁生产”由一个外在于个人的价格系统来指挥，个人和企业只需要在自利动机下决定很少的事情。拿一个农民来说，作为生产者，他只需要根据给定的农产品价格、利率水平和均衡的工资水平，决定生产数量和生产方式，而且可以预期，他的利润几乎等于零。作为消费者，一方面他根据均衡的工资率决定工作和闲暇的分配方式，从而决定其劳动收入水平。后者又成为他根据自身偏好决定消费品选择的唯一约束。在面临风险的情况下，例如自然灾害的影响，他可以象经典教科书里关于火灾保险的例子所述，在完美的保险市场上，购买一个公平的完全保险，从而实现“期望效用”最大化。

虽然这个回答具有部分的正确性，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，即使保留理性人假定，它对于中国的农民行为描述仍然存在巨大的偏差。粮食保护价（美国也如此）的存在表明产品市场上的价格信号是扭曲的，它实际上鼓励了农民生产过多粮食，而由政府指定的垄断组织来收购（这是必要的，因为竞争的市场不会接受过高的价格），于是产生了社会无效率以及诸多的激励扭曲。资本市场的信贷配额在农村更是广泛存在，因此才出现所谓的“关系贷款”、“有钱贷款”等现象。劳动力市场则是在城乡分割的格局下，难以形成对农村劳动力的正确价格信号，城市带给农村劳动力的，既有政策不确定性造成的交易成本，也有企业行为不规范导致的风险成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实际上被低估了，这（有意或无意地）限制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，对农业产业化所要求的资本、土地流动也起到了阻碍作用。

也许最严重的问题出在风险市场的缺乏上。它体现在农产品市场（缺乏期货市场）、资本市场（银行在农村作用削弱、龙头企业上市融资遭到质疑）和劳动力市场（缺乏有效的合同机制）等几乎所有方面。而风险问题的解决又和激励机制密切相关。家庭承包制提供了激励，却也使单个农户暴露于风险之中。粮食保护价提供了保险，却是以农户和粮食机构的激励扭曲为代价。更不要说政府主导的结构调整即缺乏风险分散机制，更是有政府本身激励扭曲的可能。使农民这个中国收入最低因而风险回避度最高的群体，农业这个最弱势但风险性很高（因而破产几率很高）的产业，农村这个经济和政治结构最为脆弱、因而对政策易变性调整能力最低的地区，承受了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的不成比例（也许是最大部分的）风险，是一个有效率和公正的社会所难以容忍

的^[3]。

对于经济系统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，经典模型认为市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，但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，中国的广大农民无时不被其困扰。这样一来（也许是唯一值得庆幸的），农民行为的研究，实际上为我们破除经济学设定的“价格接受者”的假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支持，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理论的空间。同时，它也为我国市场制度的完善（虽然其终点永不可及），和政府发挥必要职能的程度，提供了绝好的参照系。也许，真正发达的社会，不需要这么多“兼业化”、“屡败屡战”的普通农户，不需要这么多“船小好掉头”的农民企业家，也不需要这么多殚精竭虑的农村支书。它需要的是一套好的制度，虽不是“无为而治”，但可以使大家“各得其所”，富裕，自由。

二、以案例方法研究中国农民行为

这本文集就是要向大家展示一个真正实证的农民行为学。正如刚才提到的，它既是对传统理论的检验，也是对它的挑战。它告诉我们，在中国这样一个尚处于市场经济初建时期（转轨时期）的社会，农民实际上是如何作出决策的，其决策受到什么约束，决策的空间有多大，决策的易变性（适应性）有多强，决策带给自己、家庭和社区的后果是什么，从而也间接描述了制度（市场制度和政治制度）对农户的影响。它没有也不可能对解决“三农”问题提供答案，但也许重要的是，它以一个相对“正确”的方式，提出了问题。而好的问题，按照夸张的说法，等于问题解决了半。

案例不仅是一种好的教学方法（这已经为各种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包含大量案例这一点所证明），它也应该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实证研究方法。虽然计量经济学已经拥有越来越庞大和精致的工具库，但它也有致命的缺陷：以（基于经济理论假定和统计特征假定的）“一般”掩盖现实中的“特殊”。对于一个处于剧烈变动的多元化社会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够的：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的结论不太可能以计量经济模型来检验。而案例研究的方法恰好可以补其所短：一方面通过个案的研究，借以发现普遍的规律，再辅之以统计的检验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探讨个人、企业和社会各种个别的因而潜在的概念模型，从而开发新的理论（数学）模型，丰富和突破经济学的已有理论；从政策层面来说，研究案例，可以使好事情推而广之，坏事情防微杜渐，实际上也是政府常用的决策辅助工具。

看看取得突破贡献的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，阿克洛夫的灵感来自旧车市场乃至印度农村信贷市场的观察（不是统计检验），供职于大学“毕分办”的斯宾塞夫人提供了他“信号”模型的原始灵感，斯蒂格利茨更是一位游历各国的“政策”经济学家，他对于转轨国家的经验观察验证和补充了他关于“信息范式”的基本理论体系。

三、结语

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固不可取，但其反面也同样不足取。“实践为体，理论为用”方是为学治国之道。所谓的纯理论研究不能将中国的经济学带向世界一流，也不能将清华的经济学带向中国的一流（如果我们还谦称自己现在还不是很一流的话），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。愿我们的同志、我们的同学有时间能读读这本文集，掩卷思之，再以行动来建设我们的经济学。

（版权所有，转载、转摘请与本中心联系）

主办：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
地址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楼302

联系电话：（010）62789695
邮 编：100084

[返回](#)

^[1] “转轨时期农民行为的案例研究”是“清华大学小林实经济学研究基金”资助的研究项目，由钟笑寒负责主持。在2002年利用学生寒假调研，已收集案例41篇，汇编成集（内部资料），取名为《农民的故事：转轨时期农民行为案例研究（2002）》。索取有关资料请联系编者，E_mail: Zhongxh@em.tsinghua.edu.cn。

^[2] “Business is not, at lease not yet, an exact science.” Se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, Learning by the case Method, Case no. 9-376-241.

^[3] 另外，中介的欠缺也是中国农村和农业面临的重大问题。中介欠缺问题的提出，是考虑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，如何设计合理的市场结构乃至政府（公司）治理机构以达到交易成本的节约。市场的结构和层次也一直是传统经济学忽略的问题。参见钟笑寒（2002）《税收中介：环状模型》，《经济学季刊》第2卷第1期（即出）。